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宗教因素分析^{*}

张崇富[◎]

内容提要: 本文从宗教的视角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因素。本文认为大量的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带来了欧洲宗教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了欧洲公共空间伊斯兰教的可见性的出现并被视为欧洲身份的威胁;而圣战恐怖主义袭击的蔓延致使欧洲的社会敌视指数居高不下,欧洲多元宗教共存治理的失败更加深了欧洲社会的对立和仇视。本文认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正是利用了欧洲社会中仇视和恐惧心理,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教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迎合了部分选民的心理,故而在欧洲政坛迅速崛起。

关键词: 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 移民 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 张崇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以“疑欧”和“反欧”著称的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正在迅速崛起,逐渐从边缘进入了欧洲权力的中心,并成为了一种“泛欧洲”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崛起?本文试图从宗教视角——即从宗教人口的变化,伊斯兰教的可视性问题,欧洲圣战恐怖主义袭击和欧洲多元宗教治理的失败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

一、外来移民和难民导致了欧洲宗教人口结构的变化

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移民问题一直位居欧盟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关注之首。2020年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动荡时期,欧洲的移民问题仍然位列欧盟层面的三大首要关注点之一。^①

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显示:近年来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为43470000,占欧洲总人口的5.9%;2020年,增加为50470000,占欧洲总人口的6.8%;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为57180000,占欧洲总人口的7.8%;到2040年,将上升为63980000,占欧洲总人口的9.0%;到2050年,将上升为70870000,占欧洲总人口的10.2%。^②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统计显示了欧洲穆斯林人口的以下4个基本事实:^③

1.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6年年中,法国有570万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8%),德国有500万穆斯林(6.1%)。穆斯林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欧盟国家是

* 本文为让-莫内最佳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欧洲一体化的辩证性”(Jean Monnet Centres of Excellence “Diversity in Unity: The Dialectic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编号: 619906-EPP-1-2020-1-CN-EPPJMO-CoE, 2020-2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欧盟委员会官网(Brussels), Latest Eurobarometer survey (July-August): Economic situation is EU citizens' top concern in ligh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2020年欧盟的其他2个首要关注点乃是:经济形势和成员国公共财政状况。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975。(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② 皮尤研究中心-邓普顿全球宗教前景项目(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 Europe,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regions/europe/religious_demography/#/?affiliations_religion_id=0&affiliations_year=2050。(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③ 这里统计的数据出自当时的28个欧盟成员国并加上挪威和瑞士2个国家,共30个国家。

塞浦路斯，该国的 30 万穆斯林约占总其人口的四分之一（25.4%）。

2. 穆斯林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仅从 2010 年年中到 2016 年年中，欧洲穆斯林的比例就上升了 1 个百分点以上，从 3.8% 上升到 4.9%；到 2050 年，欧洲大陆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可能会翻一番以上，将上升到 11.2% 甚至更多。

3. 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比其他欧洲人口更年轻，人口生育率也更高。2016 年，全欧洲穆斯林的年龄中位数为 30.4 岁，比其他欧洲人的年龄中位数（43.8 岁）年轻 13 岁。欧洲穆斯林妇女平均生育 2.6 个孩子，高于非穆斯林妇女平均生育 1.6 个孩子的数据。

4. 2010 年至 2016 年间，移民是推动欧洲穆斯林人口增长的最大因素。其间，约 250 万穆斯林来到欧洲，约 130 万穆斯林获得了难民身份。^①

侯赛因·卡特尼（Houssain Kettani）《欧洲穆斯林人口：1950—2020》一文则总结了 1950 年至 2020 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变化。卡特尼的研究显示，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从 1870 年和 1950 年的 2% 到 2020 年增加到 6%。自 1950 年以来，欧洲大陆人口（非穆斯林）增长率（APGR）不断下降，从 1% 下降到 2010 年的 0.1%，位列世界各大洲最末位。欧洲大陆穆斯林人口的相应的人口增长率目前是欧洲大陆人口增长率的 10 倍。因此，穆斯林人口比例预计将继续上升。^②

以上的数据表明，二战以来，大量的穆斯林移民的涌入，以及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欧洲宗教人口比例的结构改变。这带来欧洲伊斯兰教标志的可视化程度急剧增加，同时也带来欧洲多元宗教共存治理的难度。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被欧洲人视为欧洲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诱因之一。

二、公共空间伊斯兰教可见性被视为对欧洲身份的威胁

随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移入欧洲，欧洲宗教人口结构的变化，欧洲的穆斯林的存在由原来的隐形走向了显性，进而引发了备受争议的欧洲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问题。

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Visibility）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社会学家吕费尔·格莱（Nilüfer Göle）将其定义为：“可见性是指不能在‘承认差异’的规范框架内完全呈现的社会行为体的编排，该框架赋予国家行动（承认）特权，并将宗教类别视为给定的和固定的。”^③ 换句话说，公共空间本来是欧洲民主传统中人人皆可进入，并进行协商和交换意见的场所。然而，欧洲对公共空间所预设的标准是基于世俗主义和男女平等的原则的，是欧洲西方社会科学中所谓的正统观念（doxa），是由希腊罗马传统和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所塑造的，是一套不折不扣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传统，因而，拒绝后来的伊斯兰教的进入，从而就造成了伊斯兰教的可见性。因此，对欧洲当地人而言，伊斯兰的可见性即意味着穆斯林及其宗教差异在公共空间的越轨、对世俗主义和欧洲当地文化规范的不服从，以及对欧洲公共性默认共识的侵犯。总之，伊斯兰教通过移民的方式跨越了地理边界，同时也以宣礼塔、

① 皮尤研究中心官网，CONRAD HACKETT, 5 facts about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29/5-facts-about-the-muslim-population-in-europe/>. (阅读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

② Houssain Kettani,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1950–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2, January 2010, pp.154–164.

③ Nilüfer Göle, The Public Visibility of Islam and European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he Minarets–Mosques Deba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SAGE Publications, 2011, Vol. 37 (n4), pp.383–392.

妇女的头巾和街头公开礼拜的方式违反了欧洲公共空间无形的文化边界。^① 这些伊斯兰教符号在公共空间的出现被认为对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威胁。

欧洲穆斯林进入欧洲社会公共空间的可见性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沉默式的，如清真寺宣礼塔和妇女头巾；另一种是重复和表演式的，如公开的礼拜。

1. 沉默式的可见性（清真寺宣礼塔和妇女头巾）。欧洲清真寺宣礼塔的案例，以2009年瑞士全民公投，禁止穆斯林在该国修建宣礼塔的案例为标志性的事件。此次公投获得了57%瑞士人投票支持禁止该国伊斯兰尖塔的议案。瑞士的公投行为引起欧洲各国的热烈讨论。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而言，清真寺宣礼塔的存在则被视为欧洲伊斯兰化的标志，意味着伊斯兰教将要接管欧洲了。禁止修建清真寺宣礼塔就是对欧洲基督教传统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捍卫。在欧洲辨识度很高的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和罩袍，被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建构为“伊斯兰政治和激进的标志”“伊斯兰律法的标志”。他们预设穆斯林妇女都是父权制的牺牲品，头巾和罩袍都是被迫戴上的。因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防止本国的妇女受到伊斯兰教的压迫；二、将受压迫的穆斯林妇女解放出来。^② 正是将伊斯兰教的标志头巾和罩袍视为欧洲文化和欧洲身份的威胁，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出台了穆斯林头巾和罩袍的禁令。^③

2. 重复和表演式的可见性（公开礼拜）。欧洲穆斯林的第二种可见性，即露天场所的公开礼拜，对欧洲人的冲击更猛烈，往往被右翼民粹主义称为一种变相的侵略和占领。以意大利为例，该国有160万穆斯林，其人口数位列欧洲第四。然而，该国仅有8座官方承认的清真寺。由于清真寺的严重不足，2009年1月，意大利的一千多名穆斯林在米兰大教堂对面的广场和博洛尼亚的马焦雷广场举行了集体街头礼拜，表面上是抗议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实际上是希望吸引公众关注众多穆斯林亟需官方认可的礼拜场所。2016年，意大利5座临时清真寺因行政原因关闭后，数百名穆斯林在罗马斗兽场外举行集体礼拜，抗议关闭意大利清真寺。意大利穆斯林将这次清真寺的关闭视为意大利政府因欧洲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而采取的一种针对穆斯林的报复行为。然而，这些街头公开礼拜却被某些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右翼政党视为一种伊斯兰政治化和伊斯兰入侵的象征。^④ 2010年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党魁马琳娜·勒庞针对法国穆斯林街头公开礼拜的言论引发了一场争论，她对其支持者宣称“在一些街区的街道上祈祷的穆斯林就像纳粹占领者一样”，从而招致很多批评。然而，马琳娜·勒庞这番言论却引起了部分欧洲人的共鸣，得到了他们的支持。^⑤

可见，在过去几十年中，伊斯兰标志和符号在欧洲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成为了欧洲各国文化不和谐和政治争端的主要根源之一。

① Nilüfer Göle, *The Public Visibility of Islam and European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he Minarets-Mosques Deba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SAGE Publications, 2011, Vol. 37 (n4), pp.383-392.

② 参见[奥地利]露丝·沃达克：《恐惧的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杨敏、徐文彬、符小丽、徐保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8—233页。

③ BBC官网, Switzerland referendum: Voters support ban on face coverings in publi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6314173>. (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④ Italy magazine 官网, Muslim Duomo prayers spur action, <https://www.italymagazine.com/italy/politics/muslim-duomo-prayers-spur-action>. (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⑤ RFI 官网, Marine Le Pen to face trial for comparing public Muslim prayers to Nazi occupation, <https://www.rfi.fr/en/france/20150923-french-marine-le-pen-face-trial-inciting-racial-hatred-comparing-muslim-prayers-occu>. (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三、圣战恐怖袭击的蔓延导致欧洲社会敌视指数居高不下

恐怖主义在欧洲并非新现象，然而近年来欧洲的恐怖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即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没有降低。欧洲刑警组织 (Europol) 在《欧盟 2016 年恐怖主义形势和趋势报告 (TE-SAT)》认为：跟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相比，圣战恐怖主义对欧盟和世界各地的威胁尤甚。^①

欧洲刑警组织目前将这种跟宗教相关联的恐怖主义暂时定名为“圣战恐怖主义”(jihadist terrorism)，并认为圣战恐怖主义仍然是欧盟目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② 欧洲刑警组织报告对“圣战”采取了狭义的定义称“圣战恐怖主义被定义为萨拉菲主义的暴力支流，是一种反民主和民选议员的复兴逊尼派穆斯林运动，认为人类立法与上帝作为唯一立法者的地位不一致。圣战分子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由伊斯兰法 (shari'a) 统治的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主要代表是基地组织网络和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③ 与其他大多数和平的萨拉菲主义思潮相反，圣战主义者参照伊斯兰经典中的圣战教义，将暴力合法化。近十几年来，欧洲刑警组织对此类恐怖主义命名和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欧洲刑警组织在 2006—2010 年间发布的年度《欧盟恐怖主义形势和趋势报告》时使用了“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ist terrorism) 一词，直接将“伊斯兰教”跟此类恐怖主义相关联；到了 2011—2014 年间的报告则抹去了“伊斯兰教”一词改用了“宗教煽动的恐怖主义”(religiously-inspired terrorism)，到了 2015 年则连“宗教”也不提了，抹去“宗教”一词以来改称“圣战恐怖主义”。欧洲刑警组织之所以不用“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宗教煽动的恐怖主义”这两个名称，主要出于以下考虑：若使用“伊斯兰恐怖主义”一词，会将一小部分狂热分子犯下的罪行与整个伊斯兰教混淆，错误地将数百万人信仰的宗教与少数人的暴行联系起来。这种称谓会加重民众的伊斯兰教恐怖症，会导致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化。而“宗教煽动的恐怖主义”一词的问题则是没能准确地描述西方，尤其是欧盟、中东、远东和非洲等地区所面临的确切问题，而这些地区的这类恐怖分子却一直在侵害并剥夺受害者的生命和财产。上述两个术语皆有引起宗教冲突的嫌疑，欧洲刑警组织意识到了这两个术语的缺陷，故而停止使用，改用更准确，更能描绘此类恐怖主义的术语“圣战恐怖主义”。

2014 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基地组织跨国活动的活跃，欧洲大陆圣战恐怖主义袭击成倍增加，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圣战恐怖主义袭击不仅使受害者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还会导致重大的经济影响。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恐怖主义与欧洲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相关。2004 年至 2016 年间，由于恐怖袭击，28 个欧盟成员国的 GDP 损失约为 1800 亿欧元。其中英国损失 (437 亿欧元) 和法国损失 (430 亿欧元) 是恐怖主义造成的 GDP 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损失 (408 亿欧元) 和德国损失 (约 192 亿欧元)。^④ 多种媒体和社交媒体渠道对恐怖袭击的广泛报道导致恐怖袭击的目击者呈指数级增长，造成了欧洲人严重的心理阴影。如果说恐怖主义对欧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短暂的，那么对人心的影响则是长久的无法估量的。研究表明，欧洲大量的恐怖袭击，不仅与

① 欧洲刑警组织 (Europol), 《欧盟 2016 恐怖主义形势与趋势报告》(European Union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6),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pp. 1–60.

② 同上，第 13 页称：“jihadist terrorism remained the greatest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EU.”

③ 同上，第 43 页。

④ The RAND Corporation 官网, Cost of terrorism in Europe, <https://www.rand.org/randeurope/research/projects/the-cost-of-terrorism-in-europe.html>. (阅读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

降低欧盟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关，还降低了欧盟公民对同胞、国家政治机构、法律体系和警察的信任。

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可见性导致了欧洲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无处不在的圣战恐怖主义的袭击，则带来了欧洲公共安全的危机。伊斯兰教可见性和圣战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欧洲各国的应对方式使得欧洲社会敌视指数（Social Hostilities Index）居高不下。据皮尤中心研究显示，欧洲社会敌视指数的中位数虽然已经从2012年的2.7分降至2013年的2.3分，但仍远高于全球的中位数1.6分。^①

四、欧洲多元宗教共存治理的失灵

随着近几十年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欧洲宗教多元的局面有增无减。欧洲宗教多元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其早期的显著特征主要是基督教内部的宗教多元和冲突，无论是11世纪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还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都没有造成欧洲文化内部无法逾越的分裂。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多元宗教的冲突早已超出了基督宗教的范畴，多元宗教共存的治理已成为欧洲当前面临的头等大事。

不同欧洲社会面临的族裔和宗教多样性挑战各不相同：北欧和西欧社会主要是过去和现在外来移民的结果，而中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宗教多样性则跟历史上存在的少数群体有关。因此，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理解欧洲的宗教多样性。

欧洲对多元宗教共存的治理有两种主要代表性的模式：一类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Multiculturalism），以英国为代表；另一类是同化模式（Assimilation），以法国为代表。为了帮助越来越多的移民迅速融入英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英国政治开始引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即认为文化、种族和民族，特别是少数群体的文化、种族和民族，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中，应该特别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②多元文化主义既是对现代民主国家文化多元化事实的回应，也是对过去遭受排斥、歧视和压迫的少数群体给予补偿的一种方式。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去包容社会不同成员的观点和贡献，同时保持对他们差异的尊重，不要求他们融入主流文化。简言之，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多样性原则将伊斯兰教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这跟法国的世俗主义原则和同化政策颇为不同。

在欧盟层面，同样奉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欧盟格言“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是欧盟建立的基石，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表达。^③欧盟层面的多元文化主义法律条款主要体现在里斯本条约架构下的《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67条等。《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称：联盟应尊重欧洲“丰富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并确保维护和增强欧洲的文化遗产”。^④《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67条第1款称：“联盟

① 皮尤研究中心官网，Sidebar: Religious Hostilities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Europe, <https://www.pewforum.org/2015/02/26/sidebar-religious-hostilities-and-religious-minorities-in-europe/>.（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② Jennifer L. Eagan, Multiculturalis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multiculturalism>.（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③ European Union 官网，The EU motto “United in diversity”. the motto of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came into use in 2000. It signifies how Europeans have come together, in the form of the EU, to work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enriched by the continent’s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traditions and languages.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symbols/motto_en [08.24.2020].（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④ European Union 官网，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ember 200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12007L/TXT&from=EN>.（阅读时间：2021年7月26日）

应在促进会员国文化发展的同时，尊重欧盟成员国和地区的多样性，同时将共同的文化遗产置于首位。”第 4 款称：“本联盟在根据条约其他规定采取行动时，应考虑到文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为了尊重和促进其文化的多样性。”^① 这些条款鼓励共同体所有的人完全参与到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同时又维系并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好愿景。欧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具体的实施中，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庆祝活动，消极宽容，成为了一种放任自流不干涉的，甚至绥靖的文化政策。欧盟在应对多元化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时，迄今为止，并不成功。过去几十年欧洲一直奉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正面临着广泛的质疑。^②

法国的同化模式政策，即所谓的 Laïcité 的模式。所谓同化，这里是指少数族裔通过采用和适应所在国文化和政治的单向过程进行的民族文化适应和空间分散的社会融入策略。Laïcité 是法国世俗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很难准确翻译，是一个混杂了历史谱系、实际矛盾和政治地理的独特术语，是法国政府和有组织宗教之间关系的几个世纪的激荡和积累而形成的一个概念。法国当代 Laïcité 的特点是国家支持的普遍公民模式，反对法国穆斯林的身份主张。法国对多元文化的不容忍使得法国人很难将穆斯林文化纳入普遍的民族认同，这跟其激进世俗主义的历史相关。法国激进的世俗主义可以追溯到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治理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其哲学遗产一直体现在当代法国的同化和融合移民政策中。法国大革命的哲学遗产对法国共和模式的发展至关重要，其关键要素：自由、平等、博爱为当代法国移民融合政策提供了文化和哲学基础。法国对多元宗教文化采取的同化的治理策略，其目的是构建法国的单一文化，并通过世俗化来减少宗教的影响。法国的共和主义拒绝对族裔和宗教团体的公开承认，在公共政策中不给他们任何特权。然而，法国强硬的世俗主义立场和同化政策，在治理多元宗教共存方面并不成功。近年来，法国头巾法案、《查理周刊》事件引起的风波和持续不断的圣战恐怖袭击事件，宣告了法国同化政策的失败。

综上所述，全球化为欧洲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移民，移民的到来形成欧洲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然而，迄今为止，欧洲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欧盟层面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的策略均不成功，这就为打着反伊斯兰教、反移民旗帜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可资利用的工具。

结论

本文集中讨论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宗教因素，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乃是欧洲存在的各种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欧洲的伊斯兰教可见性日益凸显；圣战恐怖袭击的蔓延导致欧洲社会敌视指数居高不下，严重破坏了欧洲的公共安全；欧洲国家和欧盟层面的多元宗教共存治理的失败更加剧欧洲社会的仇视、对立和分裂。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正是利用了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和仇视而崛起。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非常擅长利用社会针对欧洲穆斯林的敌对情绪，渲染并灌输恐惧。

① European Union 官网，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326, 26.10.2012, p. 47–39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12012E%2FTXT>.（阅读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

② 2017 年 10 月 7 日，巴黎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赖的欧洲》（The Paris Statement—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 <https://thetrueeurope.eu/>）（阅读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中文译文参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643478741/>.（阅读时间：2021 年 7 月 26 日）

右翼民粹主义者自称为人民的代表，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将“穆斯林移民”建构为“他者”“外来者”“敌人”“入侵者”“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将“伊斯兰教”建构为“病态”“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①一种不宽容、不自由、父权制的、男女不平等的、野蛮落后的，完全不能与欧洲文明相容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竞选宣言中，反多元文化、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政治主张居于核心地位。这些主张相互关联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也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选民赢取选票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反多元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反伊斯兰化（anti-Islamisation）；反建制就是反对与“人民”相对立的“精英”们；反全球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反移民，主张从欧盟的手中重新收回国家对经济和边境的控制权等。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归罪于建制派的精英们，迁怒于他们对市场、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迷信，让大量的移民进入欧洲（尤其是大量的穆斯林移民）。

总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了欧洲社会对移民、伊斯兰教的仇视，以及对本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失望，敢于突破“政治正确”的限制，明确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教的政治纲领，因而受到了部分欧洲民众的欢迎，并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政坛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 周广荣）

（上接第8页）

国公司研究发布的 ChatGPT 软件支持人机对话，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发展的认知。这也提醒我们在数字文明建设过程中，新技术的运用对数字文明建设又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将数字风险转化为数字机遇，需要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进程，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安全，需要全方位地进行治理，推动数字空间治理。

总之，网络强国战略、数字中国建设、新时代数字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网络立法，增大网络执法力度，加强互联网各层次的立体管理模式，重视移动网络空间和固定网络空间的管理，化解“信息茧房”风险，将数字风险转化为数字机遇；同时针对互联网宗教的特殊性，加快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和技术支持，准确把握互联网宗教运行和发展规律，有序地建立各种语言的宗教网站和管理体系，传播宗教正确的知识，全方位的多途径的传播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治理网络宗教风险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在数字文明建设进程中，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基于互联网空间治理理论，研究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逻辑，提出建构数字化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的实践体系，以国家治理逻辑、依法治理逻辑、综合治理逻辑、技术治理逻辑以及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治理逻辑切入，高效精准治理互联网宗教，化解或降低互联网宗教风险，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有助于新时代数字文明建设，有助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The Guardian 官网, 'I don't hate Muslims. I hate Islam,' says Holland's rising political star, <https://www.google.com.tr/amp/s/amp.theguardian.com/world/2008/feb/17/netherlands.islam>. (阅读时间: 2021 年 7 月 26 日)